

出版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信息技术发展、语言产业繁荣与教育领域改革等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外语学术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汇聚国内外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了“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

“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按一个话题一本书撰写。每本书深入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精选经典研究及原创研究案例，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文库”在整体上具有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与引领性，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经典与创新结合、国外与国内结合，既有全面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细致的分析。

“文库”项目邀请国内外语学科各方向的众多专家学者担任总主编、子系列主编和作者，经三年协力组织与精心写作，自2018年底陆续推出。“文库”已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型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出版。我们计划对这套书目进行不定期修订，使之成为外语学科的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为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了解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并有望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期待“文库”为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与成果传播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王文斌 王克非 文秋芳 张 剑
委员：蔡金亭 陈 红 刁克利 董燕萍 高一虹 韩宝成
黄立波 蒋 严 马秋武 秦洪武 司富珍 谭惠娟
王东风 王立非 徐 浩 许家金 许 钧 杨金才
袁毓林 张 辉 张 威 朱 磊

“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王克非

“理论翻译研究系列”主编：王东风

“应用翻译研究系列”主编：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研究系列”主编：许 钧

“语料库翻译研究系列”主编：秦洪武 黄立波

“口译研究系列”主编：张 威

目录

总序	王克非	ix
前言	范祥涛	xiv
第一章 中华典籍外译与研究概述		1
<hr/>		
1.1 引言		1
1.2 中华典籍外译的起源和模式		2
1.3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概述		5
1.4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视角		7
第二章 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		10
<hr/>		
2.1 引言		10
2.2 哲学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10
2.3 “四书”外译研究		13
2.4 《易经》《礼记》外译研究		19
2.5 其他哲学典籍外译研究		24
2.6 选题建议		32
第三章 中华历史典籍外译研究		35
<hr/>		
3.1 引言		35
3.2 历史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36

3.3 《史记》《尚书》外译研究	37
3.4 其他历史典籍外译研究	45
3.5 选题建议	53
第四章 中华诗词歌赋典籍外译研究	54
<hr/>	
4.1 引言	54
4.2 诗歌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55
4.3 《诗经》和楚辞外译研究	57
4.4 唐诗外译研究	71
4.5 宋词外译研究	78
4.6 其他诗词外译研究	81
4.7 选题建议	85
第五章 中华小说典籍外译研究	86
<hr/>	
5.1 引言	86
5.2 小说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87
5.3 “四大奇书”外译研究	95
5.4 “两部巨著”外译研究	118
5.5 其他小说典籍外译研究	122
5.6 选题建议	128
第六章 中华戏剧典籍外译研究	129
<hr/>	
6.1 引言	129
6.2 戏剧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130

6.3 元杂剧名著外译研究·····	133
6.4 其他戏剧外译研究·····	135
6.5 国外中国戏剧典籍外译研究·····	138
6.6 选题建议·····	139
第七章 中医药典籍外译研究	140
<hr/>	
7.1 引言·····	140
7.2 中医药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142
7.3 中医四大经典外译研究·····	145
7.4 其他中医药典籍外译研究·····	152
7.5 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研究·····	156
7.6 选题建议·····	160
第八章 研究案例	162
<hr/>	
8.1 研究案例（一）·····	162
8.1.1 引言·····	162
8.1.2 “四书”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163
8.1.3 《易经》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169
8.1.4 结论·····	172
8.2 研究案例（二）·····	172
8.2.1 引言·····	172
8.2.2 链式转喻·····	173
8.2.3 汉语典籍中链式转喻的英译·····	180
8.2.4 结语·····	183

第九章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未来趋势 184

9.1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取得的成就 184

9.2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存在的问题 185

9.3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未来研究建议 188

参考文献 197

推荐文献 231

索引 234

汉学人名译名索引 236

总序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中介和桥梁：翻译也是不同语言容器里文化内容的交换。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皆与翻译密不可分，怎么估量它的意义也不为过。然而，翻译的价值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对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也远远不够。

季羨林先生曾从事非常重要的文化翻译工作，对翻译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极高的评价。他谈及五千年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却始终绵延不绝、蓬勃发展的原因时，曾这样说：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一语道尽翻译对中华文化的演进、对人类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巨大作用。

翻译活动最基本的三个要素是语言、文化和译者。语言离不开民族、社会、文化，并浸润其中；双语文本转换离不开执行转换的人，即译者；

译者则必定是因某种语言文化滋润而生又受到另一种语言文化“增补”的人。于是，翻译成为语言文化间的信使。在翻译三要素中，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语言这个要素。因此，从古至今对翻译的关注都从语言开始，都跟语言分不开。这既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

但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一方面，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若无翻译，语言的交流、认知和传承等重要功能就难以充分展开；没有翻译，人们只能与来自本地域的人而不能与来自其他地域的人深入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分享经验和探讨问题；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Casagrande(1954: 338)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背后都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单在语言的差异上，而是在文化的距离上。

由此可见，翻译的中介性是双重的，它不单表现为传统认识上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样直接的中介性，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中介性，即译文间接地对所译入的母语及其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特殊的人类思维与人类交往活动。

对于翻译这样重要而又复杂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抱有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和探究心：

从思维层面尝试阐释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理论翻译研究的着力思考点；

从实践层面努力解决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翻译文化史上下求索的要点；

从各类语料库驱动的视角考察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趣所在；

从古至今频繁进行的口译活动，则是探究隐秘心理过程的关键实验台。

这套“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即分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文化史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研究五个板块，对翻译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

“理论翻译研究系列”梳理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总结概括翻译学方法论在中西方的发展历史及特点，并对翻译研究中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的新兴研究领域作了重点介绍。本系列首批计划推出《国外翻译理论发展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译学方法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等四部图书，其特点如下：(1)纵横阐述。这些图书既从历时的角度描述了翻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历程，还对当前的主要观点和流派，特别是对最新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模式作了细致的分辨和论述。(2)中外互鉴。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了系统归纳，透视出中外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和理念的异同。(3)点面结合。既有对理论和流派的全面梳理，又兼顾对研究热点和研究走向的前瞻式分析。

“应用翻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不仅有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和实施效果探讨的《翻译教学研究》，以及以翻译教学应用为导向的、以实证型研究方法为主的《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还包括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在具体领域(如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中如何应用的《实务翻译研究》。此外，随着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技术发展迅速，成为现代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害，《翻译技术研究》也是本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之一。

“翻译文化史研究系列”重在探讨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作用。翻译文化史研究是在当下学科疆域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指导我们在译学领域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展开的重要译学课题之一。这个系列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翻译文学、文化史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研究,以及中文小说的英译研究,这些都是我国近十年来翻译研究发展最为显著的领域。此外,该系列还有专著对翻译史研究方法加以阐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类双语语料库的创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平行语料或类比语料进行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青睐,研究范围涉及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语体变化、语言对比、翻译规范、翻译教学、语言接触以及相应的双语语料库技术等等。“语料库翻译研究系列”首批策划出版的选题包括以下六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双语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语料库文体统计学方法与应用》《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基于双语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这些选题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兼顾文学文本与应用文本翻译,将数据检索与统计方法运用到语言和翻译研究当中,实现了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形式和意义、文体和诗学分析的有机结合,代表了大数据时代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十多年来发展迅速,摆脱了过去经验式的探讨,开始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关于口译(包括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等)认知过程各类实证研究。“口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包括从学科建构视角梳理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方法路径、提出整体性口译研究框架的《口译理论研究》,致力于口译教学方法应用和实施效果探讨的《口译教学研究》,以及系统探讨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的《语料库口译研究》。

以上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译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当然，丛书也有未顾及的一些问题，如翻译叙事研究、机器翻译、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弥补。我们期待通过这套丛书，与读者共同探讨翻译研究的种种重要问题，梳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评介主要的理论、方法、流派，判断和设计研究课题，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推介重要的参考文献。希望读者朋友，特别是初涉翻译研究的青年研究者能够开卷受益，拓宽视野。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季羨林，2007，《季羨林谈翻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Casagrande, J. B. 1954. The ends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 335-340.

前言¹

古话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记得还是在2016年，许钧先生耳提面命，告诉我王克非先生在组织编写一套“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其中有选题“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嘱咐由我承担。当时我正在着力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选题同属中华典籍外译研究这一领域，因此虽然感觉又是一副重担，还是欣然答应下来。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就仰承许先生关爱，如今再蒙赐教，委以重任，感激之情亦油然而生。

多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一直呈欣欣向荣之象，成果卓著，分领域编写综述类著作，撮其概要，继往开来，何其盛事。怎奈日常诸事繁多，分身乏术，书稿编写任务一拖再拖，一晃就是三年多。每次出版社询问编写进展，均信誓旦旦，承诺某年某月某日前一定完成，自己也信心满满，无奈还是耽搁太久。每次见到两位先生，都像欠了一大笔债。此刻初稿既成，虽感释然，依然心怀惭愧。

2017年夏天，费两月之功检索文献，竟然发现这项工程真可谓浩大。我不敢怠慢，立即动手，宵旰劬劳，笔耕不辍，历时三载始得初稿。最初构思全书框架时，计划以研究主题统领结构。着手写作时却发现，如果采

1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研究”（15BYY033）的研究成果。

用这样的结构设计，需要将大量文献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而考虑到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涉及文献之多、范围之广、主题之杂，按主题设计结构实非易事。相反，以典籍类型设计全书结构则相对容易；我对典籍外译已有前期研究基础，检索文献后对现有研究也有了大致了解，辅以网络检索文献，最终厘定了全书的写作结构。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也根据实际研究状况适当调整。

本书书名为《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其实际含义是“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研究”，目的是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论，概括其成就，检视其中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选题类型方面的建议，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就已经翻译出版的中华典籍而言，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哲学典籍、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典籍、小说典籍、戏剧典籍、中医药典籍等六大类。实际上，已经外译出版的中华典籍还有其他类型，如文论、散文、兵书、地理典籍、科技典籍、农业典籍、百科典籍、法律典籍、艺术典籍等。但是，这些典籍的外译本和研究文献均数量较少，因此不纳入本书述评范围。即便如此，获取已有研究文献亦非易事。本书对中华典籍翻译研究文献检索的范围大致作如下界定：中文研究论文以中国知网检索为主，中文专著、论文集以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及其他网络平台获取文献为主；英文论文主要检索JSTOR等英文论文数据库，英文专著则以谷歌图书、亚马逊图书检索和其他网络平台获取文献为主。

对于每一种典籍的研究文献的综述和评论，大致采用统一的文献检索方法：

1) 按照固定方式检索知网论文：以“典籍书名+翻译”为关键词，按“主题”进行检索，必要时也采用其他关键词按“篇名”检索，以缩小检索范围，减少检索结果。其他注意事项包括：(1) 有的典籍翻译研究检索结果数量较大，因此除引用已有统计外，对检索结果不再作进一步筛选和精确统计，可采用知网的“结果中检索”功能进行二次检索，以定向获取综述研究类、语料库类或定量研究类、传播影响研究类、非英语外译研究类

等文献。(2) 试检索发现, 各类典籍外译研究文献均在21世纪初出现明显增长, 20世纪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 但一般质量较高。因此, 在检索每种典籍外译研究的论文时, 均使用知网检索界面的“发表时间”排列功能, 特别关注2000年前的研究论文。

2) 除了知网检索结果较多或无法准确定位的典籍外译研究目标文献, 如《红楼梦》《大学》等, 一般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浏览, 选取和下载选题新颖、发表层次较高、研究类型特殊的论文, 并分类存放, 便于按研究主题类型逐类概括和述评, 以提高概括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层次性。

3) 对于每种典籍外译研究的知网论文, 如果数量较大, 将对每一类文献进行二次分类, 比如翻译史研究论文可以进一步分为早期翻译史研究、翻译史统计研究、翻译史描写研究等, 以便提高综述的层次性和概括性。在综述和评论过程中, 首先逐类浏览论文内容, 概括要点, 而后分类概述每类研究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 为总结研究建议作准备。

4) 对知网论文进行述评时一般采用统一的述评结构。(1) 依托知网检索界面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 概括检索结果呈现的总体趋势, 进行研究论文趋势分析; 必要和可能时, 也适当进行手工统计, 为下文的分析描述提供数据支撑。(2) 对数量较多且特色不明显的论文, 仅作整体特点分析和概括, 如典籍外译的内部研究论文往往数量较大, 因此主要概括其特点, 并不一一评述。(3) 对于上述的综述研究类、语料库类或定量研究类、传播影响研究类等类型的论文, 大致按其重要性排序, 作重点评述。

5) 就每种或每类典籍外译研究进行述评时, 也大致采用相同的述评结构, 包括外译简史、国内研究论文、研究文集或专著、非英语外译研究论文、外语研究文献等。当然, 中文文集、专著和外语研究类文献一般数量较小, 或未检索到文献, 因此述评中或者不提, 或一笔带过。为了减少本书参考文献数量和所占篇幅, 有些论文和专著仅简述要点, 不列入参考文献。

全书成稿后, 除前言外共九章, 主要关注国内外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在高质量的经验式研究、综述研究、定量研究、翻译史研究、传播研究、非

英语外译研究、外语书评等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为中华典籍外译和相关研究提供概览，便于读者了解中华典籍外译简史、翻译模式、研究现状概貌以及已有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考察哲学典籍、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典籍、小说典籍、戏剧典籍和中医药典籍的外译研究。每章的结构设置基本相同：(1) 引言简述该类典籍的外译史和主要译本，为综述已有研究进行基础性准备。(2) 基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统计数据为该类研究提供概览。(3) 对文献数量较多的已有研究进行概述，主要涵盖本书关注的核心话题。(4) 在主要典籍和主要研究文献之外，针对文献较少或难以归类的同领域其他典籍外译研究，单设一节。(5) 每章在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研究选题建议，难免主观，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具体而言，第二章的哲学典籍外译研究以“四书”“五经”为主线，但“五经”中有三种分属诗歌和历史典籍，因此只考察《易经》《礼记》的外译研究。其他哲学典籍主要包括《道德经》《庄子》等。第三章历史典籍外译研究以《尚书》《史记》为主，还涉及《汉书》《资治通鉴》《三国志》《战国策》《左传》等，研究文献相对较多。第四章为诗词歌赋典籍外译研究。由于这类文献检索难度大，只能以中国历代诗歌类型为线索检索文献，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外译研究为主线，此外还考察了赋体诗、乐府诗、陶渊明诗歌、元曲等的外译研究。第五章关注中华小说典籍外译研究。这类研究文献量最大，特别是《红楼梦》的外译研究，国内外研究论文较多，也有数量可观的研究专著。本章参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用“四大奇书”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两部巨著”指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主要述评以上六部小说的外译研究。明清时期小说创作繁荣，名著较多，外译也多，因此本章也考察了《浮生六记》《聊斋志异》等小说的外译研究。尽管《老残游记》《东周列国志》《好逑传》《镜花缘》等小说的外译研究文献也不少，但出于篇幅和结构平衡的目的，本章未作述评。第六章聚焦中华戏剧典

籍外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戏剧的历史不如诗歌、小说等悠久，经典著作较少，外译更少。本章在统计之后，主要考察了元杂剧和明清戏剧名著的外译研究。由于文献总量不多，内容以总体概述为主。也是出于结构平衡的目的，本章单设一节概览国外中华戏剧典籍的外译研究，当然以书评为主。本书第七章考察中医药典籍外译研究。中医药典籍外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研究起步也较早。本章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药名著经典外译研究为主，其他典籍则包括《本草纲目》《银海精微》《洗冤录》《医学源流论》等。显然，中医药典籍外译的最大难点是专业术语翻译及其标准化。从检索到的文献看，该领域的研究者大多来自中医药大学，因而中医药典籍外译需要得到更多外语界学者的关注。第八章选取笔者已发表的两篇中华典籍外译研究论文，以为读者提供研究案例方面的参考。本书最后一章根据全书的综述，概括了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取得的成就，也总结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供读者研究时参考借鉴。

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多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许钧先生多次关心研究进展情况，并就撰写理念、研究视角等给予指导，鼓励我多下功夫，保证质量。王克非先生对全书结构设计、研究方法等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审读初稿后就本书结构和一些关键表述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建议。初稿完成后，编辑部在十多天内完成了十几万字的审读，对书稿的修改提出近三页纸的修改意见，就全书结构、内容、体例乃至语言等，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对提高书稿质量弥足珍贵。编辑部董一书女士（前一位是张丽娟女士）经常友情提醒，为推进研究和书稿撰写发挥了积极作用，编辑步忱也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了支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全书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大批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的研究文献。初稿所列参考文献近750条，考虑到书稿篇幅，在第一次修改时通过改变正文表述方式，删减了部分参考文献。如此这般，实在是出于控制全书字数和篇幅的考虑，并非为掠他人之美。

此外，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有海量文献，以一己之力恐怕难以完成这项工作。自2015年以来，我也指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研究开展相关研究。特别是2019年毕业的三名研究生颜页、陆碧宵、江雨蒙，为研究作出了较多贡献。颜页专门研究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刊载的中华典籍英译，制作了杂志刊载英译典籍汇总表，此外还撰写了第六章初稿；陆碧宵筛选出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中所有中华典籍英译，制作汇总表格，共计1300多条，并通过网络检索补充了原书目遗漏的信息，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江雨蒙研究了《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刊载的中华典籍英译，制作了典籍英译汇总表。另外，该校近年来的几届英语专业研究生也或多或少开展了相关研究，为本书撰写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论文。

以上提到或未提到姓名的专家、研究生和工作人员，以各种方式对本研究和书稿撰写帮助良多，在此谨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任何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尽其所能地对某一领域的研究作出微薄贡献。此时此刻，不禁想起读书时几位恩师的谆谆教诲。我的硕士生导师、著名散文翻译家高健先生曾经教导说，学生要好好读书，才不愁将来做研究。我的博士生导师、知名翻译研究专家冯庆华先生曾提醒，凡有所引，务必作注。我的博士后导师、著名翻译理论家张柏然先生也曾指出，文科不同于理科，在理科领域后来的研究可能会否定已有研究，而文科研究相互印证，互为关联，成就了人类文化的代代传承。再细想书稿撰写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感慨读书不精，引证不注，书稿中难免存在瑕疵。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有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知之可曰明哲，其意不在否定，惟望学界诸君通达，海涵书稿之弊，谅解所论之本心。诚如是，幸甚至哉！

范祥涛

2020年2月20日

中华典籍外译与研究概述

1.1 引言

中华典籍外译所涉范围很广。汉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同时，典籍外译指典籍译成所有外国语言。因此，中华典籍外译既有典籍翻译、典籍外译、典籍英译、典籍西译，也有汉籍翻译、汉籍外译、汉籍英译、汉籍西译等概念。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领域广阔，迄今发表的文献数量巨大，既有国内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等，也有国外相应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学或汉学专著。仅以典籍英译为例，可在知网检索到大量论文，所见专著60多部。国外汉学家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主要有五种形式：(1)译者在译作前言、后记、附录、注释中提供的副文本信息；(2)汉学家在外文杂志上发表的译作评论；(3)汉学家将中华典籍翻译与原著思想述评、翻译评论相结合的著述；(4)汉学家的著述中零散载有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相关内容；(5)大量外语文献中所涉及的中华典籍外译和研究，形式包括直接翻译中华典籍部分内容作为引文、直接或间接引用已有典籍外译本。

显然，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数量巨大，国内外已有的典籍外译研究相关文献足以充栋。故此，有必要梳理这些文献，考察其主要研究论题，概括

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审视其研究发现与不足，以承前贤之宏论，淪后学之新思，启象胥之心智，弘中华之文明。

1.2 中华典籍外译的起源和模式

中国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据罗新璋(1984: 1)研究,《周礼·秋官司寇》记有“象胥”,即通言语之官;《礼记·王制》载有四方之内对翻译人员的不同称谓,“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则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

中华典籍外译历时逾千年之久。马祖毅、任荣珍(1997: 2)认为,最早的汉语典籍外译大致发生在“公元508年与534年之间”,即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其间“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北魏永平初年来华)曾将中国僧人昙无最的《大乘章义》译成梵文”。诸子百家哲学典籍外译则始于唐朝。据称,“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乃命玄奘翻译”(马祖毅、任荣珍 1997: 3)。于是,玄奘“奉太宗皇帝之命与蔡晃、成玄英共同翻译《老子》为梵文,并交予东天竺使者带回西域”(杨剑霄 2011: 31)。玄奘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将汉语典籍外译的中国人(吴争春 2013: 96)。其后,中华典籍译成多种亚洲语言,如波斯语、日语、越南语、朝鲜语等。

不过,中华典籍西译却相对较晚,最初由来华传教士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基督教传教士共四次来华:(1)公元7世纪唐太宗时期景教徒来华。(2)公元13世纪元朝时景教徒再度来华,同期来华的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3)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江文汉 1987: 1);有研究表明,自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来华传教士近千人(费赖之 1995; 荣振华 1995)。(4)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历经艰难而不弃,

纷至中土。唐朝和元朝来华传教士未留下多少印记，而16世纪以降的来华传教士不仅人数多，更有大批著述或中华典籍翻译传之后世。

毋庸置疑，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与搜集情报信息。他们试图通过翻译欧洲科学技术书籍打开传教之门，因此从事了大量天文观察和地图测绘工作，在美术、数学、建筑、文学、医学、史学、语言音韵学等领域开展诸多研究，出版著作（荣振华 1995：2）。这些出版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著述，为“学术汉学”做了重要铺垫（Lundbæk 1991：29）。较多研究文献表明，其间传教士还把汉语典籍译成欧洲语言。据称，利玛窦¹于1593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雷慕沙认为利玛窦是“最先编辑中国字书而附以欧洲语言之解释者”，但译文未刊行（费赖之 1995：46）。先行到达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于1581年开始翻译汉语典籍，所译《大学》部分内容于1593年刊印（岳峰、郑锦怀 2010：27）。再者，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羨于1592年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Chan 2015：181）。研究者认为，高母羨是研究汉语典籍并将其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Chan 2003：67；Chan 2015：182），而罗明坚是最早来到中国并将汉语典籍译成拉丁语的耶稣会士（Gunn 2003：237）。

就主题而言，19世纪以前传教士所译汉语典籍主要是“四书”“五经”，另有历史、文学、地理、科学等方面的著述（Lundbæk 1991：29）。这些以其他欧洲语言出版的汉语典籍译著，有些不久被转译成英语，使汉语典籍翻译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现有文献显示，第一种转译成英语的中华典籍是《大学》；译文最初作为一个宫廷布道的附录，初版于1685年，但只译出《大学》开篇到“则近道矣”，这是中华典籍首次以较大篇幅出现于英语世界。

随着19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来华，中华典籍外译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有些新教传教士直接将中华典籍翻译成英语，使典籍译作在英

1 本书附有“汉学人名译名索引”，可查阅汉学家的外文名，故正文中仅保留其中文名。

语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Morrison 1812) 翻译出版《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Horæ Sinicæ: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而最早直接英译中华典籍著作的是传教士马士曼 (Marshman 1809), 他部分英译和出版了《论语》, 书名为《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其后的19世纪, 大批传教士来华, 其中翻译中华典籍较多的传教士包括英国的柯大卫、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湛约翰、德庇时、理雅各、翟理斯, 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丁韪良等, 其中尤以理雅各英译中华典籍为著。理雅各的翻译模式为学术化翻译, 或称研究性翻译, 即在翻译过程中深入研究所译典籍。而后随着西方汉学中心转移到美国, 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研究者成为研究和外译中华典籍的主力。同时,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 也有一些汉学家独立地从事中华典籍外译和研究。

19、20世纪之交, 中国学者开始独立外译中华典籍, 其中最早外译中华典籍的是辜鸿铭, 他于1898年英译《论语》(Ku 1898), 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大幕”(赵长江 2014: 209)。从此, 中华典籍外译不再由传教士和汉学家所垄断。20世纪, 更多中国学者参与中华典籍外译, 翻译典籍数量较多者包括民国时期的林语堂、苏曼殊, 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大告、孙大雨、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 以及当代的许渊冲、汪榕培等。中国人独立外译中华典籍与此前传教士、汉学家的翻译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译者均胸怀传播中国文化的愿望, 林语堂就曾于1934年写下“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宏愿(王兆胜 2005: 6)。20世纪末, 中国政府启动《大中华文库》翻译工程, 旨在弘扬中华文化, 增强文化软实力, 重塑国家形象。因此, 当下的中华典籍外译, 其翻译模式、组织方式、翻译目的等, 均与其他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大异其趣。此外, 还有一些海外华裔汉学家开展了积极的中华典籍外译工作。

1.3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概述

浏览国内外研究文献后发现,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涉及诸多具体层面,涵盖了典籍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迄今为止,国内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国内中国知网论文、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汉学著作、文化文学交流史著作。国外对中华典籍外译的专门研究较少,相关研究文献可分为几个类型,前文已述。这些研究文献数量巨大,每种文献就典籍外译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探讨,呈现出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主题范围广阔的研究现状。

就典籍类型而言,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天文、数学、农业、科技、中医、地理、兵法、百科、法律、艺术、佛经、家训、蒙学等。就内部研究而言,这些研究文献涉及语法结构、意义、修辞、风格、文化负载词或文化术语、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就外部研究而言,现有研究文献主题涉及翻译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形象、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伦理、翻译批评、译本传播和影响、文化误读等。此外,尚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类型的主题。首先,关于译者的研究主要考察在中华典籍外译史上作出突出翻译贡献的翻译家及其成就,如理雅各、翟理斯、Arthur Waley、辜鸿铭、林语堂、杨宪益夫妇等;另外还关注译者主体性、译者伦理、跨文化能力、译者文体、翻译策略和技巧等层面。其次,典籍外译史研究考察了典籍翻译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研究史料拓展、撰写方法、分类史研究(如中医典籍翻译史)、断代史研究(如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再者,中华典籍外译综述研究关注研究现状、存在问题、未来方向或趋势等主题。此外,中华典籍外译的教学研究涉及翻译教学改革、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中华典籍融入英语教学的必要性等,特别是有些研究提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更要培养大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迄今为止，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专著所见仅60多种，研究主题包括哲学典籍、古典诗歌、小说典籍、古典文论等类型典籍英译的翻译理论、翻译标准、翻译批评、文学审美、语言分析、接受史、翻译史、传播与影响等。研究专著更为深入地考察了某部典籍或某类典籍的外译情况，不过在所见60多种专著中，有20多种研究古典诗歌翻译，而研究其他类型典籍外译的专著则数量较少。此外，国内汉学著作、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专著也涉及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但资料零散，搜罗费时，汇集尤难。

国外专门研究中华典籍外译的文献数量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文献发表数量不多，另一方面这类文献的检索和获取难度较大。迄今为止，仅见一些评论典籍翻译的杂志论文。就华兹生《史记》译本，美国汉学家德效骞(Dubs 1963: 205-206)认为译文流畅，但增加过多、用词不准、违反编史规范。对倪豪士《史记》译本，张磊夫(de Crespigny 1996: 597-598)认为译文准确，但略显笨拙，且术语译名不够精确；而戴梅可(Nylan 1996: 136-138)经过比较后则认为译文准确度很高，但译文中不加区分地使用拼音，容易给读者造成理解混乱。除了这种直接评论外，汉学家的评论还见于译作的前言和后记，如John Major(2010: 46-47)在《淮南子》译本前言中介绍了翻译工程始末、译文体例与结构安排。此外，汉学家在著述中也常常把典籍外译与原著思想述评、翻译评论相结合，如戴梅可译“五经”、罗思文等译《孝经》、宇文所安译中国文论等。以上三类著述中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多为经验之论，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

西方汉学家的著述中也零散载有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因其在汉学研究过程中会关注外译典籍，著作中会有评论或者引用外译典籍的内容。另外，还有大量外语文献涉及中华典籍英译和研究，这些著述或直接翻译中华典籍部分内容作为引文，或引用已有典籍外译本，包括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比如，英国汉学家Raymond Dawson在其《中华帝国的文明》(*Imperial China*)中，直接引用了美国汉学家狄培理所编《中国传统之渊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淮南子·主术训》的英译文，间

接引用了华兹生英译《史记》中的内容；宇文所安在其著作中直接翻译了孟郊的诗作，并解释了诗中关键词的翻译方法；再如医学杂志编辑S. J. Marshall在其论著中直接引用了白居易《黑潭龙》一诗的译文；德国作者Theresia Buser-Rüther在其英文著作《太极拳：运动与冥思》（*T'ai Chi Chuan: Movement and Meditation*）中长篇引用了对《琵琶行》的解释和译文。这些著作数量巨大，不过要检索到这些相关文献，并把有关中华典籍外译的材料搜拣出来，确非易事。

总之，国外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文献数量虽多，但过于零散。另外，与国内丰富多元的中华典籍外译学术研究相比，国外研究大多具有经验性特点，主要是对译文的直觉式评论。当然，这些引用、评论也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中华典籍外译在外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由于语言障碍或其他多种原因，迄今为止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仅研究中华典籍英译；对于翻译成其他语种的译文，相关的研究文献整体上数量不多，且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和理论高度。

1.4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视角

上文1.1节提到，本书按照典籍类型设计全书结构，这种设计主要是为结构安排之便，以避免从研究理论视角融汇全部研究文献的诸多困难。但是，考察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视角有其重要意义。科学的学术研究一般会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使整个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可以说考察研究的理论框架就是在考察其科学性。

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Robinson 2014: 9），他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写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字对字地翻译，而是要保存语言的整体风格和力量。”西塞罗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翻

译理论的创始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西方的翻译研究以碎片式散述的形式为主，主要呈现为译作或著述前言。虽有诸多理论阐述，但均不成体系。Eugene A. Nida (1964) 和 John Catford (1965) 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取向翻译研究之嚆矢，也标志着系统翻译研究的发端。此后的几十年间，翻译研究的各种理论取向相继问世。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翻译研究流派的统称，也指一个学科领域。这一概念最早由 James S. Holmes (1972/1988) 创造，后经 Gideon Toury、André Alphons Lefevere 等人的发展得到广泛使用。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经验式翻译研究、语言学翻译研究、描写翻译研究、多系统翻译研究、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研究、文化派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伦理学翻译研究等 (Munday 2008)。

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Toury (1995: 10) 曾根据 Holmes 的会议论文绘制了翻译研究理论框架图。在此基础上，Jeremy Munday (2008: 12) 对“应用翻译研究”的三个层面作进一步划分，从而使翻译研究理论框架趋于完善。当然，Anthony Pym (1998: ix-19) 批评了这一框架图的种种不足，特别是其中缺少翻译史的位置；Pym 还专章讨论了翻译史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组成部分以及研究翻译史的原因等。

Toury (1995: 87-112) 在其描写翻译研究的专著中，论证了描写的单位和描写方式，提出了组对式 (coupled pair) 对比描写。不过，这种组对描写只涉及译本对比研究，因此只是翻译研究的部分研究对象。范祥涛 (2004: 61-62) 在一般意义上阐述了翻译描写研究对象，认为翻译研究应涵盖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一切因素：制约翻译选择的目标文化、由此形成的多层次翻译目的、译者文化立场、翻译策略、译本对比、翻译批评、翻译的社会功能、译本的传播和影响等。Louis G. Kelly (1979: 1-2) 提出翻译研究包括翻译内部研究和翻译外部研究，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当

然，翻译研究还应该着力描写翻译主体，即实施翻译行为或翻译活动的译者。Pym(1998: 160-176)曾专章讨论了译者的类型、作用、特点等。

中国古代的翻译研究与西方相似，大多为载于译作前言的直觉式评论。现在所见的最早译论为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1984: 22)的《法句经序》，其中有言：“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因循本旨，不加文饰。”20世纪上半叶，国内翻译研究依然囿于翻译方法之争。直至1981年，国内首次引介Nida的翻译理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时期(林书武 1981)。经过近20年的介绍，国内翻译界于20世纪末开始关注西方语言学取向之外的其他翻译研究流派。

上一节论述表明，中华典籍外译专门研究文献主要在国内，而国内的研究文献则以知网论文为主。因此，梳理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关键是考察国内的知网论文。考察知网论文选题后不难发现，目前国内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均不出上述理论取向之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类型：翻译研究、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源于自然科学的描写观念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研究，也主导了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国内外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主流理论框架，仍然是描写研究范式下的西方翻译研究理论。

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

2.1 引言

中华哲学典籍外译始于16世纪末，上文1.2节提及罗明坚译《大学》部分内容、利玛窦译“四书”等。自此至18世纪末，中华哲学典籍首先被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再转译成英语。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中华典籍外译进入新教传教士直接英译的阶段。至19世纪末，辜鸿铭等中国学者开始独立翻译中华哲学典籍。20世纪初以降，中华哲学典籍翻译数量日渐增加，各类研究文献也随之渐增。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研究专著等发表或出版，从多个层面对中华哲学典籍翻译展开学术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2.2 哲学典籍外译研究统计分析

就外译研究而言，中华哲学典籍主要包括儒家哲学著作(包括“四书”、“五经”中的《易经》《礼记》和宋明时期的理学著作)与诸子百家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著作的译文或译作并不普及，或者并不完整，相关研究文献也相对较少。以著作名加“翻译”“英译”“外译”“西译”为关键词，

按“篇名”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1 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知网论文统计表

著作	数量	著作	数量	著作	数量	著作	数量
《大学》	22	《礼记》	56	《淮南子》	7	《列子》	1
《中庸》	273	《孝经》	34	《吕氏春秋》	3	宋明理学	14
《论语》	688	《道德经》	341	《荀子》	35		
《孟子》	180	《墨子》	54	《管子》	27		
《易经》	169	《庄子》	221	《韩非子》	1		

在检索到的所有文献中，有近三分之一研究《论语》的翻译；此外研究文献的检索结果超过百篇的有五部著作，按顺序分别是《道德经》《中庸》《庄子》《孟子》《易经》。其中，“四书”翻译研究论文近1200篇，占总数的54.7%。这也表明，国内对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研究过多地集中于“四书”翻译，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这大概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典籍译本数量、典籍译本获取的难易程度、典籍原著的影响力。当然，《大学》外译的研究论文较少，也许与检索不够充分有关，因为关键词“大学”既指书名，也有其他指称。

国内最早研究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的论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柯大翎(1985)简要介绍了《易经》翻译及其在西方的影响，评介了由卫礼贤的德译本转译的《易经》英译本，也指出了译文存在的缺点。李贻荫(1988)直觉地评论了著名华裔汉学家刘殿爵英译的《道德经》，也举例说明了其中对原文的误解。冯禹(1988)在介绍《管子》英译本和译者李克的基础上，概括了译文的五个特点。宋立民(1989)则翻译了一篇发表于1988年的英文书评论文，原文作者为汉学家叶山，评论了李克对《管子》的翻译。

概而言之，早期的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论文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 所有论文均为经验总结。这种现象延续了20多年，进入21世纪，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才逐渐增强。这与国内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基本同步：1980—1995年，国内翻译研究主要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形成一种“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其后进入“沉寂期”（林克难1998）。(2) 典籍翻译研究者的数量较少，研究者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不过，李贻荫在1984—1998年间发表中华典籍翻译研究论文36篇，其中26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哲学典籍翻译研究论文8篇，其中《易经》翻译研究6篇，《道德经》翻译研究2篇，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国内学术界在迄今35年间对这些哲学典籍翻译研究论文仅引用56次。(3) 这一时期的翻译评论既概括优点，也指出缺点，与后来翻译批评中的纯粹褒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注意到，在国内的中华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很早就有研究者关注国外期刊的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并翻译介绍。而今，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文献仅限于国内期刊论文，对国外相关研究关注不够。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1) 学术研究不够规范，有些研究者简单检索文献后就开始浅尝辄止地概括散论；(2) 有些研究者急于求成，极少对相关文献进行穷尽式检索；(3) 外文文献检索难度大，获取难度更大；(4) 信息时代借助网络检索文献日益普遍，但这种检索方式很可能疏漏一些重要文献；(5) 有些研究者文献浏览量不足，不能借助已有文献获取相关文献。

除论文外，迄今国内也出版了一些中华典籍外译研究著作，但研究哲学典籍外译的著作数量较少，仅见《论语》《道德经》翻译研究专著各两种，《庄子》《孝经》各一种，另有两种研究儒家典籍外译，此外还有以“典籍”“汉籍”为主题的研究著作五种。尽管如此，这些翻译研究著作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哲学典籍的外译研究开始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

国外的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多为汉学家的研究，且多为经验之谈，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此外，还有大量外语文献涉及中华哲学典籍外译

和研究。这些外文著作为数众多，全部涉猎实属不易，深入研究，尚待来者。

2.3 “四书”外译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国内的中华哲学典籍外译研究论文以儒家典籍外译研究为主，其中又多集中于“四书”，尤以《论语》居多。在中国知网按“主题”检索，《论语》翻译研究检索结果超过千篇，按“篇名”检索也近700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比如选取某种语言或文化理论视角，探讨翻译策略、译文风格、文化负载词、译者主体性等，甚至不乏众多经验式、随感式论文。采用篇名加文献来源的关键词（杂志名称），对全部论文的来源进行检索，则发现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少之又少。统计结果如下：

表 2.2 核心期刊历年刊载《论语》外译研究论文统计表

期刊	数量	首次刊载时间	期刊	数量	首次刊载时间
《中国翻译》	8	1985年	《外国语》	3	2010年
《中国科技翻译》	2	2007年	《外语学刊》	5	2010年
《上海翻译》	8	2005年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	2013年
《语言与翻译》	0		《外语与外语教学》	5	2008年

《论语》翻译研究论文中，仅有33篇发表于翻译类或外语类核心期刊。而且，除《中国翻译》外，其他几种期刊至2005年之后才开始刊载《论语》翻译研究论文。

知网可视化分析工具可以为各类论文的计量研究提供支撑。国内“四书”外译研究论文的可视化总体趋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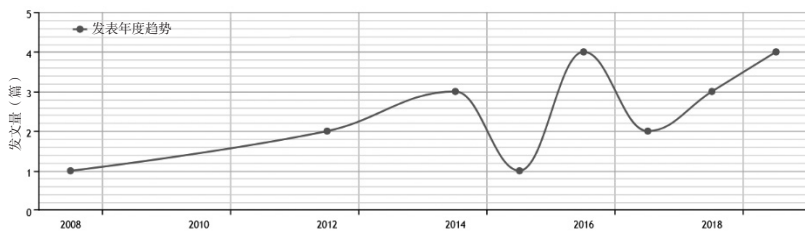


图 2.1 《大学》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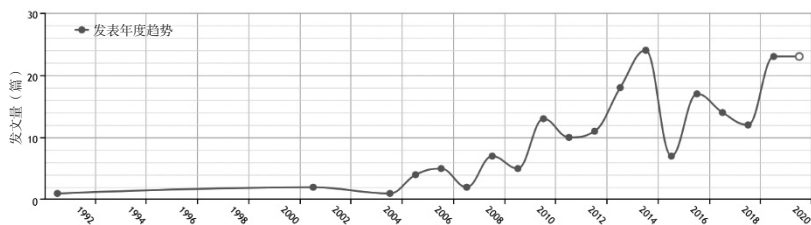


图 2.2 《中庸》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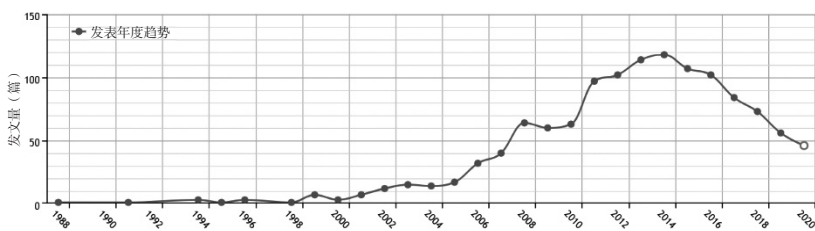


图 2.3 《论语》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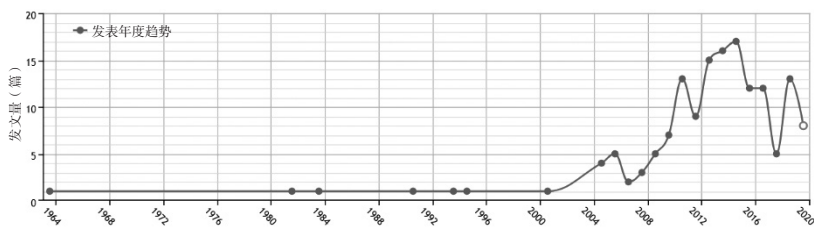


图 2.4 《孟子》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趋势图表明,几种典籍的外译研究论文均在21世纪之初出现明显增加,并在2014年前后达到峰值。几种典籍外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的发表时间见下表:

表 2.3 “四书”外译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时间对照表

典籍	首篇论文发表时间
《大学》	2008年
《中庸》	2004年
《论语》	1985年
《孟子》	2005年

表2.3显示,《大学》外译研究开始时间最晚。国内第一篇《论语》翻译专门研究论文发表于1985年,以较长的篇幅评介了理雅各、辜鸿铭、苏慧廉、Waley、Ezra Pound等名家的《论语》译本,并且举例论述了各种译本的特点和不足,以及在正确理解和恰当表达方面存在的共同问题(曹惇 1985)。《中庸》《孟子》外译研究首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04年和2005年。“四书”外译研究中,从首篇论文到论文数量峰值之间的间隔时间均比较短,仅《论语》外译研究例外,间隔时间达10年以

上。这表明,就整体而言,国内典籍外译研究在较长时间内均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论语》翻译研究的全部检索结果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发现,这些论文所研究的译本中,研究次数最多的是辜鸿铭的译本(106次),其次为理雅各译本(51次)、安乐哲译本(25次)。据称,《论语》全译本和节译本共有60多种(李钢、李金姝 2013),但大多数研究仅集中于少数几个译本,显然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其次,《论语》翻译研究论文的数量自2000年开始逐渐增加,2008年前后每年新发表论文超过50篇。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超过5篇的作者共12人,发表《论语》翻译研究论文超过10篇的高校19所,这表明典籍外译研究在一些高校已经形成研究团队。所有论文中,获得国家项目支持的32篇,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支持的76篇,可见有些研究与国家战略或区域发展的关联性更加紧密。

检索发现《大学》外译研究论文22篇,其中期刊论文15篇,硕士论文6篇,报纸文章1篇,研究的译本集中于理雅各译本(13次)、辜鸿铭译本(6次)、马礼逊译本(6次),主要关键词包括深度翻译、翻译行为、翻译风格、忠实性、译者主体性等。显然,研究论文数量较小,2016年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也仅有5篇。有综述研究认为,2005—2015年间的《大学》翻译研究主要为译本对比,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对比研究仅集中于少数几种《大学》译本;研究内容局限于核心概念,存在重复;译本对比视野狭窄;理论视角不够多元(袁晓亮 2015: 45, 79)。当然,近年来也有高质量研究论文关注典籍翻译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孙英丽 2009)以及国外典籍翻译研究概述(于培文 2016)等。

相对而言,《中庸》外译研究论文数量更多,研究译本主要为辜鸿铭译本(75次)与理雅各译本(50次),主要关键词分布较为分散,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中华典籍、翻译观、中国文化、译者主体性、规划策略等。就“资源类型分布”看,期刊论文占53%,硕士论文占36%。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主体中,硕士研究生群体数量较大,如

果得到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将会显著地推动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发展。然而，这些硕士论文的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近年来，更有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于核心期刊发表。不过，《中庸》翻译研究开展的时间较短，研究视野较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的《中庸》翻译研究应关注畅销译本的翻译策略和语言特点、翻译评论，为翻译实践提供实证素材(陈梅、文军 2013: 24)。

《孟子》翻译研究论文同样集中于理雅各译本、赵甄陶译本、辜鸿铭译本等少数几个译本，主要关键词包括文化负载词、目标读者、翻译动机等。其中，期刊论文占52.8%，硕士论文占37.2%。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季红琴(2011)的研究概述了《孟子》的翻译简史。有综述研究认为，目前《孟子》翻译研究注重语言层面，集中研究理雅各英译本，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应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杨颖育 2010)。

近年来，在摆脱纯语言转换研究之后，“四书”外译研究逐渐开始突破传统，关注国家文化战略，考察典籍翻译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研究《论语》英译对西方当代汉学的促进作用。这些论述均深化了典籍英译研究，也反映了翻译研究的本质。另外，典籍翻译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也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内“四书”翻译研究的成果以论文为主，也有几种专著出版，多为概论，专门研究《论语》英译的专著有两部。在专著中，金学勤(2009)在对比《论语》的理雅各和辜鸿铭英译本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孔子形象建构，同时考察了《论语》英译的传播和影响，论述了译者对中华核心文化概念的英译阐释。显然，这一研究关注中华典籍翻译的几个核心问题：翻译目的、核心概念、文化传播和形象建构。王勇(2011)概述了《论语》的英译历史，从认知语言学转喻理论视角探究了翻译过程中意义选择的转喻性以及制约这些选择的外在因素。这一研究假设关乎翻译过程的本质属性，有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尽管仍需更多研究加以验证。在概述类著作中，马祖毅、任荣珍(1997: 33-96)合

著的《汉籍外译史》以专章述评诸子百家哲学著作的外译历程及其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另外述介了“四书”“五经”在朝鲜、越南和日本的传播。该书材料翔实，特别是手工搜集了19世纪以前中华典籍外译的相关资料，实属不易。李玉良、罗公利(2009)考察了儒学核心概念的英译，包括“仁”“义”“礼”“忠”“孝”“子”等，论述了19世纪末以来儒家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并讨论了未来儒家思想的翻译和传播战略。谭晓丽(2012)从翻译伦理学视角研究了汉学家安乐哲的儒家典籍翻译，探讨了译者的翻译动机及其对儒学典籍的文化态度。赵长江(2017)出版的中华典籍英译的断代史主要描述了19世纪汉语典籍英译，特别是传教士对儒道典籍的英译，论述了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典籍翻译在“中学西渐”中发挥的作用。显然，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的基础之一，典籍翻译断代史书写可以深入考察典籍翻译过程涉及的诸多层面。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中华典籍翻译史的通史与类别史等。

概论专著中还有另外一种层次更深的研究，即从中华典籍翻译的视角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形象的建构。张西平(2016)在其新著中以翔实的史料，系统研究了中华典籍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填补了国内在16—18世纪中华典籍西传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全面梳理了“四书”早期的拉丁语翻译以及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在全球史观的视域下系统探究了16—18世纪中华典籍对欧洲思想界产生的影响，并在附录中提供了儒家经典的翻译信息和摘录。早在该书出版10年前，周宁(2006)以两卷本专著，在知识结构的广阔视野中考察了西方自13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和重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形象建构和重构的动机和原因。这种研究为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开启了全新视角，对未来的典籍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外“四书”翻译研究以英文书评为主。于培文(2016)借助两个英文论文数据库，发现“四书”全译本和单译本的相关翻译研究论文共297篇，其中“四书”9篇，《论语》22篇，《孟子》22篇，《中庸》8篇，《大

学》4篇，合计65篇，另外有研究理雅各、《论语》、《孟子》、孔子、子思的论文232篇。该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国外“四书”翻译研究的全貌，并总结道：“这些文章出自翻译名家或汉学家之手，译本研究视角多样，高屋建瓴，分析透彻”（于培文 2016: 159）。但作者在两个数据库中均没有发现《大学》英译的相关论文或书评，而其他三种典籍的译作均有英文论文评介（于培文 2016: 165）。

2.4 《易经》《礼记》外译研究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其中《诗经》属诗歌，《尚书》《春秋》属历史典籍。因此，本节仅考察《易经》《礼记》的外译研究。表2.1统计表明，“四书”之外，《易经》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也相对较多，而《礼记》的翻译研究则相对较少。下图显示了《易经》外译研究论文的发文数量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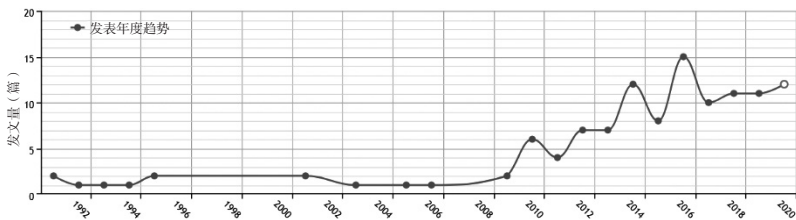


图 2.5 《易经》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图2.5显示，《易经》外译研究在21世纪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16年前后发文章量达到峰值。《易经》翻译研究论文最早发表于1985年，该文关注从卫礼贤《易经》德译本转译的英语译本，介绍了译本的翻译背景、重要性、具体内容，并举例说明译本时隔久远，没能“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

(柯大诰 1985: 119-120)。其后30多年发表的论文中, 期刊论文113篇, 占66.9%; 硕士论文29篇, 占17.2%, 博士论文10篇, 占5.9%。虽然论文总数不多, 年均不到6篇, 但是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

1) 这些论文的主要关键词包括卫礼贤、理雅各、闵福德, 研究主题主要有译本对比、文化负载词、译文风格、翻译策略、译文特点等。可见, 研究论文以翻译的内部研究为主, 较少关注翻译外部。当然, 早在1991年, 就有论文评介了《易经》在法国的翻译、传播和影响(王东亮 1991)。至2009年, 有更多研究探讨了《易经》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吴钧(2011)回顾了《易经》的翻译和英译史, 分析了其英译中存在的问题。杨平(2015, 2017)分阶段深入探讨了《易经》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 更借助阐释学理论梳理了西方《易经》翻译和阐释的不同流派, 发现西方对《易经》的解读视角多样, 表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色。甚至有研究考察了《易经》翻译对美国音乐家音乐创作产生的影响(黄军 2009)。张的妮、廖志勤(2015)则概评了国内《易经》英译研究, 将30年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总结了已有研究取得的三方面的成绩——细致勾勒了《易经》在西方翻译传播的历史轨迹、译本评论结论一致、研究理论视角丰富, 同时归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成果少、刊载刊物分散、研究范围窄、研究深度不够。

2) 部分论文集中在特定的研究机构, 也有一些研究者发表了数量较多的研究论文, 知网论文可视化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 2.4 《易经》外译研究知网论文发表机构与对应作者分布统计表

机构	数量	占比 (%)	作者	篇数	占比 (%)
西南科技大学	16	9.5	任运忠	12	7.1
山东大学	12	7.1	吴钧	6	3.6
深圳大学	8	4.7	陈东成	8	4.7
华东师范大学	7	4.1			
上饶师范学院	6	3.6	熊谊华	6	3.6

统计显示,有五所高校发表论文六篇以上,但仅有四位研究者达到这一水平。这表明:(1)学界有些研究者多年来集中精力研究《易经》外译,取得了显著成果,深化了主题研究,提升了研究水平。(2)在某些机构中,一位研究者深入开展中华典籍的翻译研究,会带动同一机构的其他研究者开展相似研究,从而拓展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围,不仅有助于形成学科研究团队和研究特色,同时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以上这两个特点,在其他中华典籍的外译研究中同样存在。

3)国内《易经》翻译研究领域有一位特殊的研究者,即任职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法国知名汉学家梅谦立。梅谦立(2011)的论文评述了柏应理等于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在序言部分对《易经》的翻译和评介,介绍了该书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影响。论文后半部分翻译了原著序言的相关内容,为无法读懂拉丁文和法文原著的读者提供了难得的翻译文献。

迄今国内外尚无《易经》翻译研究专著出版。不过,检索发现国外发表有一些英文书评,主要评价理雅各和卫礼贤的《易经》译作。理雅各译本直接译自汉语典籍,1882年收入《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16卷出版发行;卫礼贤将《易经》译成德语,1924年出版,而后英国翻译家Cary F. Baynes于1950年将其译成英文出版。

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于香港重印后,康奈尔大学教授Harold Shadick(1963)发表了书评,介绍了理雅各所译“四书”“五经”的翻译出版过程与得到的评价,其中简介了《易经》翻译的版本信息。20世纪对理雅各《易经》译作的书评仅见两种。前者(Woodard 1964)从内容看应该是纽约多佛(Dover)出版社1963年重印本的前言,介绍了《易经》的内容和重印本的版本信息。后者(Kaltenmark 1971)为简短的法语书评,所评译作为纽约的大学图书(University Books)出版社1965年的重印本。

卫礼贤所译的《易经》英语转译初版后,有多个不同版本或重印。初

版译作的译者序言由四个部分组成，介绍了《易经》的用途、历史与翻译的编排。译者在序言开篇就声称：“《易经》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三千年中国文化史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成分，几乎均从该书中汲取了营养，或者均影响了对该书的阐释”（Wilhelm & Baynes 1950: 75）。在序言最后，译者介绍了翻译策略和译文编排方式：译文形式尽可能简洁明了，以便保存原著的古色古香；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作在结构上进行了特定编排（Wilhelm & Baynes 1950: 94-96）。

译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有很多知名学者撰写书评。西方学界的翻译书评一般包含翻译背景或轶事、原著内容、译作优点和缺点等几个主要部分，当然也会涉及译作的其他方面，但是对翻译的评论着墨较少。所见最早发表《易经》翻译书评的学者是德效骞（Dubs 1947: 443-444），他在文中介绍了德语译者对“易”的细致描述，认为译文具有“令人愉悦、干净利落的”风格，“译作是这部艰涩、重要的儒家经典迄今的最佳译文”。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 1950: 327）在《易经》英译本出版当年撰写了较长篇幅的书评，解释了英语转译的原因，认为英译本“成功保存了卫礼贤德语译本的意义，同时译出了地道的英文。在某些方面，英译文改进了德语译文，因为其中的大量新增注释使语言更加清晰”。卜德特别对比分析了卫礼贤和理雅各的译本，认为前者更简洁、自由和富有想象力，无疑更准确地把握了原文的精神和意义，而后者略显累赘、生硬与乏味。不过，卫礼贤的译文存在两大问题：材料编排不当以及对材料年代和作者归属的判断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卜德相信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英文译本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是英语世界的最佳翻译。

Baynes《易经》英译本出版的第二年，著名汉学家修中诚发表了译作书评。修中诚（Hughes 1951: 73）认为：“这两卷译作反映了译者和出版社的极大努力，双方不遗余力，使得极其丰富庞杂的内容，读来清楚易懂……”译文中对很多技术术语意义的洞察理解，以及除原文翻译外补充的原译者的大量细节性评论，对读者而言尤其有价值。多年后，美籍华

裔汉学家陈荣捷(Chan 1968: 429-430)撰文评论道:“卫礼贤的翻译和Baynes译自德语的忠实英译,的确值得称赞。与汉语原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原文和译文几乎没有有什么不一致之处。”陈荣捷将其与理雅各译文进行比较时指出,卫礼贤译文偏重宗教层面,理雅各译文偏重哲学。韩子奇(Hon 2005: 317)对比研究了理雅各和Baynes的《易经》英译本,探讨了两者阐释中国经典的独创性,认为其异同似乎表明“理雅各翻译文本所言,而卫礼贤翻译文本的意味”。理雅各早期翻译中国经典的目的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后来作为大学教师,其翻译中华典籍的目的是展现世界上存在的不同的文化体系。相比而言,卫礼贤的翻译目的是要用中国智慧“治愈和拯救现代欧洲”(Hon 2005: 327)。

在理雅各英译《易经》之后的一百多年内,国内外出版了很多不同的《易经》译本,也有一些英文杂志发表书评。英国汉学家和佛学家蒲乐道、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华裔汉学家林理彰、美国翻译家柯立瑞等人的《易经》译本均有英文书评。比如,评论者认为蒲乐道的译文使用了“最简单的语言”,因为译者发现卫礼贤译本有时很不清晰(Sivin 1966: 290)。

《礼记》英译始于理雅各(Legge 1885),其单行本出版于1885年,迄今已有多种重印本。此外还有Helen Waddell、翟理斯、林语堂等人翻译的节译本。

《礼记》外译研究在知网的发文数量趋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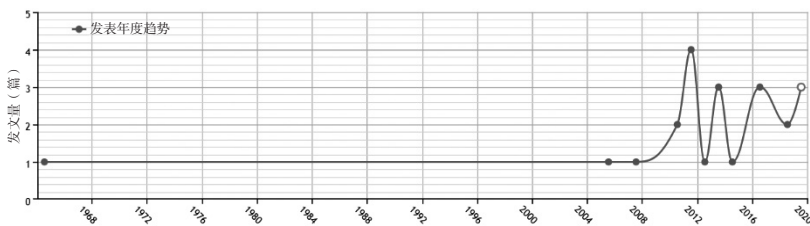


图 2.6 《礼记》外译研究知网论文总体趋势图

图2.6表明,《礼记》外译研究相比其他典籍开始得更晚,且文献数量更少,实际上仅检索到17篇论文,而且发表层次不高。不仅如此,其中有7篇论文的作者均为宋钟秀,这也表明《礼记》外译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对比研究、海外传播、文化负载词等。最早研究《礼记》外译的学者李贻荫(1993: 55)对比分析了翟理斯英译《礼记·檀弓》所用技巧,认为译文“流畅可读,不显斧凿,除挽歌是‘中国货’之外,没有土气,只有洋味”。另外,吴玥璠、刘军平(2017)比较详细地概括了《礼记》英译史及《礼记》在海外的传播。此外,谢海涛(2012: 111-115)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评介了《礼记》最早的西文译本,即法国汉学家加略利于1853年出版的法文译本。理雅各在翻译《礼记》时曾参考过加略利译本,且评价甚高;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则认为译文枯燥乏味,大量使用括号也影响了阅读的连贯性。国外研究方面,创刊于2014年的《中国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杂志第一卷刊载了一篇研究《礼记》传播史的论文,论文附录罗列了对原著的各种评论、研究和翻译(Liu & Habberstad 2014)。整体上看,国内外《礼记》翻译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研究主题范围同样较小。

2.5 其他哲学典籍外译研究

上文2.2节提到,“四书”“五经”之外,诸子百家哲学著作以及宋明理学著作也得到了外译;因后者的翻译研究文献极少,本节主要评述先秦诸子百家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文献,其知网论文检索结果如下表所示: